

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

——《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》评价

张英聘

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史上,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时期,海外贸易在唐末、五代以后,经宋、元的发展,到明代出现了崭新的风貌。明代以前的东南亚古国,迭常向中国朝贡,绝大多数的王国被视为中国的藩属,而朝贡制度则沿用到明代才趋于完备。明代前期,朝贡贸易作为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的唯一途径,在实施运作中,在“厚往薄来”的原则下,中国与东南亚各国(甚至远及西亚和东非)的海上交通、经贸往来,超越以往而达致高潮,南海诸蕃国(当时东南亚各王国)来明入贡的也达数十国之多,与之相伴,明代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外交也大放异彩。

关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研究,以往学者有过不少的论述,但多在双方友好往来方面着墨用力,平情而论,题材不免有些单一,而且以其反映历史事实的全貌,又不免有失偏颇之处。从实质而言,明朝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,在友好交往之外,还涵盖其它方面的内容,而且同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,也应是此项研究的范畴,是一项有待开发的课题。邱炫煜先生著《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》一书,可谓在这方面作了某些尝试性的研究,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力作,不仅史料翔实引证得体,而且立论新颖多有创获,这充分反映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硕果。

该书以明代的朝贡贸易为线索,依历史发展的动向,归纳为三个时期,分成六章二十节来展开论述。从洪武初年到宣德五年(1430),是明朝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;宣德六年(1431)至正德六年(1511),是明朝消极发展朝贡贸易的时期,朝贡贸易急速衰落;正德七年(1512)至崇祯十七年(1644),在西方殖民者东侵之后,明朝对东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陷于困境而衰微,相反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却在赓续进行。与此同时随着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等殖民者的东来,东南亚各国逐渐沦为进行商贸的基地或海外拓展的殖民地,彻底改变了东南亚各国的历史。因此,这从一定程度上而言,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史,实质上就是朝贡贸易的兴衰隆替史。

在朝贡贸易这一构架下,举凡“南海”指涉的范围,“诸蕃国”的地理位置和地域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溯源、册封制度、朝贡贸易、赏赐贸易、私人贸易、明代各时期南海政策的递嬗、东南亚诸国面临殖民者东侵前后的兴衰等问题的相关研究,自然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书中,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,除了明代的实录、官修或私修的明史及有关对外关系的著述外,还参考了马来纪年、大越史纪、越史通鉴纲目以及近人专论等大量的外文资料,来阐述明朝与南海宗藩关系的推演。

本书一大特色是运用大量的图表和量化分析,起到了文字表述难以言及的效果。如《明帝国朝贡圈的地域分布图》,作者虽然只是在大的范围区域内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,但却令人一目了然并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在附表中,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南海遣使表和南海诸蕃国入贡表的排列,不仅可以了解历次派遣使臣的身份,奉使的国家、出使的目的,而且通过历朝朝贡国入贡资数的量化统计,分析明代朝贡贸易的兴衰,给人以直观和动态的感觉,反映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变化。

本书另一大特色是正文文字涉及繁繁者,一笔带过,改由注释中表达,从而使正文与注文互相映射出“精”与“博”的层次,不仅言而有物,而且给人以全面完整之感。

该书体例完善,其论述涵盖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全貌,并对有关层面作了专题性的论述。如该书

第三章洪武初年到宣德五年(1368—1430)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,除了对明太祖、成祖、仁宗、宣宗对南海诸蕃国的政策及其效果、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外,对此时南海诸蕃国的形势也进行了系统的评析。在十五世纪前的东南亚地区,仍是许多小国林立的状态,时而出现在不少作为南海交通中心的港口城市和霸主。明朝建立后,由于太祖采取了怀柔远人的政策,在贡船免税的情形下,诸蕃国也纷纷摆脱周围强国的束缚,独自遣使如明,改向明朝朝贡。太祖而后成祖诸帝均采取了积极的方式,因而从永乐以迄宣德年间,南海诸蕃国入贡的情形,呈现爆炸性的风貌,形成朝贡贸易的新局面。作者在书中,对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分析后指出“此一新形势受到中国的政经政策所影响”。作出这样的论述,就使得作者并没有孤立、片面地就问题而论问题,在论述南海诸蕃国之间关系的同时,还看到各国关系的变化与明朝的关系。虽然有些似专题性研究,但与全书又没有割裂之感,表明作者在论述上不仅注意到了层次,而且还注意到了系统性和完整性。

作者基于这样的认识,在系统的框架内,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所深入和突破。理论分析,深入独到。而且考证纠谬,细致精审,有更正前误的正确记载。如郑和、王景弘等下西洋被喻为“明初盛事”,研究成果丰硕,卓有成就者亦不胜枚举。自梁启超首开先河之后,向达、冯承钧、张星烺等学者在资料的搜集、考证及相关研究方面,均作了大量的探索。近年来,相关文献的整编及学术性的文论、专著不断出现,关于郑和的研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,然而作者以《明实录》所载为主,钩稽有关史料,对于几项有争议性的问题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如永乐二十二年(1424)正月,郑和奉命前往旧港,《明史》列为第六次下西洋。作者采纳学者管劲丞《永乐二十二年受命未行考》(载《大公报》史地周刊九十四期,1936年7月17日)一文观点,认为郑和此次奉使并未成行。为此,作者一方面参诸史籍所载,考澄此事;另一方面通过停止出使期间郑和等守备南京史事的分析,指出成祖去世和仁宗下诏停止下西洋事,实与当时的形势有关,而且“借重郑和、王景弘所领的下蕃官军协助镇守南京的措施,为的就是防止汉王高煦之变”,“有国防安全上的考量”。把这样的分析同明朝的社会、政治、军事背景以及国都的迁徙变动连系起来考虑,这正是作者论述新颖之处。作者在郑和下西洋这一表象下,在分析明初诸帝对东南亚诸国攻略的同时,又联系到诸帝的政治举措,如对仁宗的用人行政方面引发的宗室政策,“增诸王岁禄”的办法,作者提出“王位更替所衍生的宗室问题似乎是明初一大隐忧,与明末宦官问题同样影响各项大政,透过丰厚的给赐,背后的用意无非是希望诸蕃王不要有非分之想,再爆发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不幸事件”。这种由表及里,由点到面的阐述,也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。

关于考证纠谬方面,试举几例:

《明史·郑和传》载:“洪熙元年二月,仁宗命和以下蕃官军守备南京,南京设守备自和始。”作者根据《明实录》等书记载,指出“率下蕃官军镇守南京者,始于王蹀通(景弘),不始于郑和。”又如《明史·仁宗本纪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戊子载“始设南京守备,以襄城伯李隆为之”实欠详,最早是由驸马都慰沐昕和宋琥守备南京。另外,如明末常将大泥误以为是明初浔泥,实误。浔泥国为文莱古代时旧称,而大泥(北大年)曾是海盗林道乾的巢穴之一。这些考证,平实而有力度,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。

总之,本书撰写体例新颖,每一章节可单独成篇,又首尾连贯,勾画出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,保持了全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。书中在研究问题时,也充分注意总结前人研究成果,观点又独成一家,文风朴实,在研究方法上,也有可供参考和借鉴之处。

当然,瑕不掩玉,作为一本学术著作,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。明中叶以后,随着官方朝贡贸易的衰微,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日趋活跃,从而导致海外贸易政策上的官民异趣。嘉靖以后,朝贡贸易完全被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与沿海互市所取代,然而本书对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的论述,似有些不足。明朝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,本书更多注意到了其递嬗和推演,对其地位、作用和影响的论述,似也欠充分。尽管如此,从总体而言,本书都不失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优秀之作,凝聚着作者多年的心血,也溶进了作者多年研究探索的心得。

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